

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 抗美援朝精神！

□ 颜 慧

东北边境时，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被彻底激发。“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文化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强敌，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这些英雄壮举，是全体志愿军精神风貌的缩影，通过战争实践的反复锤炼，最终凝聚成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前8个月以运动战为主，之后进入边打边谈的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战略相持阶段，我方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又坚持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最终迫使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后，全军通过广泛开展“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的大讨论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志愿军将士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抛头颅、洒热血。全国掀起订立爱国公约热潮，开展爱国生产竞赛运动。至195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80%以上人口订立爱国公约。工人们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东北地区工人掀起在1951年创造价值相当于1040万吨粮食的增产运动。山西劳模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于1951年向全国发出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至10月有1000万农民参加爱国丰产竞赛，当年全国粮食、棉花等农作物产量超过1950年水平。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国人民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力量，最终赢得了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经此一战，中华民族开始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精髓。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抗美援朝战争中，革命英雄主义体现在用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消灭一切敌人。一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就是一部志愿军将士人人争当英雄、争立战功、争先杀敌的历史。战争中涌现的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铸就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丰碑。面对强敌的绝对制空权和优势装备，志愿军能守住阵地，战胜敌人，靠的就是一个敢字：敢于近战、敢于夜战、敢于拼刺刀、敢于牺牲。长津湖一战，志愿军身着薄棉衣、忍受饥饿，让美国人在“最寒冷的冬天”，遭受了“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辛的磨难”。美军撤退时，沿途看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冰雕群像：志愿军战士们俯卧在雪地上，手握钢枪，保持着战

斗姿势。志愿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进行了“不上英雄墙，便涂烈士墙”的铮铮誓言，仅上甘岭一役就有38名“黄继光”式的勇士与敌人同归于尽。特级英雄杨根思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三个不相信”正是志愿军将士不畏艰难困苦、敢于战天斗地的生动写照。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最具标识的内核。抗美援朝战争是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志愿军将士坚信“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一把炒面一把雪”的顽强意志坚持战斗。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最艰难的时刻，战士们只能用尿解渴，但他们依然保持乐观心态，用罐头盒当鼓敲，用笛子伴奏，唱起了《我的祖国》，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革命忠诚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底蕴。只有纯粹的革命忠诚，才会激发最深沉的力量，涌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毅决绝的伟大壮举。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钢铁武装”的美军，志愿军将士“决不畏惧，决不动摇，上级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邱少云能经烈火焚身而纹丝不动，黄继光能够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用胸口堵住机枪眼，孙占元战斗到最后一口气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些英雄行为背后的支撑都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广大群众自发踊跃参军参战，出现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人口2000万人的浙江省就有100多万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参军。全国掀起踊跃支前热潮，仅东北地区就有60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志愿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全国人民在后方无私支援，靠的就是对党的无比忠诚和信赖。

国际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有机组成。当战火烧至鸭绿江边，我们该不该出兵？毛泽东指出，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关心兄弟邻国的鲜明立场。中共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出发，更是着眼于世界的和平。在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战斗友谊。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期间，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全力帮助朝鲜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三次潜入冰冷的水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救出落水的朝鲜儿童，献出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朝鲜领导人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起万古长存”。

精神丰碑

于敏，1926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氢弹之父”，他毕生致力于组织领导核武器研制工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我国氢弹突破和核武器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荣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称号、“共和国勋章”等荣誉。

“国产土专家一号。”于敏1944年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就读，但他更向往基础科学探索。出于对理论物理的热爱，他于1946年主动申请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将主攻方向锁定为理论物理。在北大理学院期间，他的学术天赋充分展现：当时北大采取匿名学号制公布成绩，每逢期末图书馆外张贴的成绩榜上，1234013号始终高居榜首。这一现象成为校园传奇，师生们渐渐知道这位神秘的1234013号正是于敏。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际，他以88.46分的优异成绩摘得北大物理系毕业考核桂冠，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攻读研究生，专攻量子场论。其导师曾惊叹：“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1950年5月，新中国创建了首个核科学研究中心——近代物理研究所。不久，正在北京大学撰写硕士论文的于敏迎来人生转折。其导师不仅将他力荐给所长钱三强，更以特聘研究员身份入所继续指导其学位论文。时年25岁的于敏由此开启核物理研究的征程，面对国内该领域近乎空白的学术基础与西方技术封锁的困境，这位青年学者以超常规强度系统梳理国

外文文献，通过自主构建理论模型进行开创性研究，展现出非凡的科研毅力。他创造性将原子核理论体系划分为实验现象、唯象模型和理论框架三个层次，尤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于敏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不仅快速缩短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差距，更引发国内外同行专家的瞩目。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恒武曾感慨：“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1957年，日本物理学会会长朝永振一郎（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率团访华期间，他与于敏交谈时，得知这位年轻人从未踏出国门留学，仅靠自学钻研就取得如此巨大成果，震惊不已，后来在自己著作中毫不掩饰地盛赞于敏，认为其成就颠覆了西方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科研能力的固有认知，并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1960年岁末，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能参与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工作。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放下既有的学术研究转向全新领域，更要彻底转入绝密研究序列。于敏深知这项任务的艰难和责任的重大，但他没

有丝毫犹豫，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是，于敏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而艰难的氢弹攻关之路，从此隐性埋名28载。

在氢弹研制起步阶段，中国既无技术积累又遭国际技术壁垒，完全处于拓荒境地。面对这种“零基础”的困境，于敏团队如同量子世界的观测者，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性。首要的挑战是计算资源的极度匮乏——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在这样的困境下，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计算尺、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在这场持续百日的科技攻坚中，科研团队通过数万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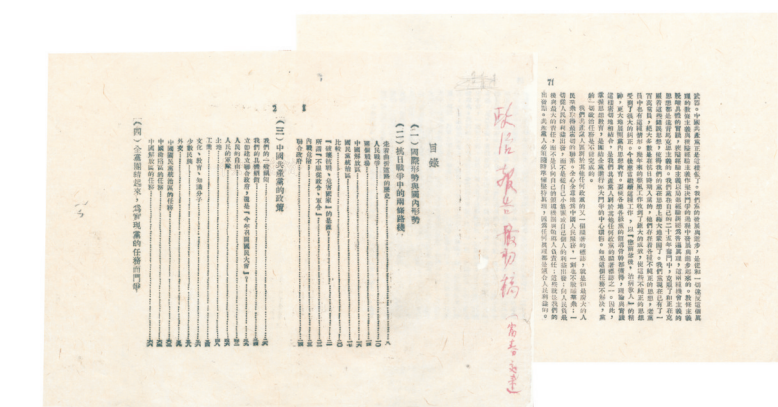
党的七大：在全党开启自我批评之风

□ 石 勇

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档案，首页用红色铅笔写着“政治报告最初稿（富春交来）”，这是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的最初稿印本。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亲自修改了8次文稿，经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向党的七大提交了书面政治报告。正是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充分的准备。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七大，但由于各种原因，七大的召开时间一再延期。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其间整整相隔17年。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发展经过了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提升，党也从各个方面对党的历史经验作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党内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部分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生搬硬套理论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和不一致，使得党的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阻碍，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党的七大召开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书面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在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对党的历史上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客观分析，着重阐述了自我批评对于党的重要性，他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将自我批评升华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他还巧妙地借用打扫房子和洗脸形象地比喻自我批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这是报告的过程稿

灰尘满面”，提醒“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直指党内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

毛泽东在作口头报告时，讲到“雷劈死人”的事情，对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征粮20万石的政策作了自我批评。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电闪雷鸣，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劈中身亡。当天一位农民的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借机发泄不满。保卫部门要追查此事，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坦诚地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讲到动情处，毛泽东站起身，向台下深深鞠躬，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代表们热泪盈眶。

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为自我批评之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他的自我批评也为代表们作出了表率。张闻天在发言中检讨了自己在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左”倾路线错误。他剖析原因、总结教训，表示自己以后必须以虚心的态度，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以达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博古在发言中，也深刻地检讨了自己担任党的总负责人期间所犯的“左”的错误。代表们也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围绕党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战略决策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许多同志以诚恳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自身经历和工作实际，对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深刻分析检讨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

思想的转变，同时也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其他同志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客观、诚恳的批评和建议，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深入开展，会场充满了民主、团结和融洽的气氛。

党的七大开展的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并非走过场，而是真心实意地查找问题、剖析原因，寻求改进的方法，使大家能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不足，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使党不仅团结了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的同志，也团结了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维护和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指出的，在大会上“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在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自我批评在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首次以制度形式明确确立，成为全党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持续开展自我批评、深化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党的七大开展的自我批评如春风化雨，让全党看到了共产党人刀刀向内的勇气。七大闭幕后，代表们奔赴各地，将自我批评的火种播撒在神州大地。其所开启的自我批评之风，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深刻觉醒和自我革新，也是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不仅对当时党的团结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所蕴含的自我革新智慧，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当今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极其深远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档案中的党史

议书迅即获得中央批复，由此启动“863核试加速计划”，极大地保障了我国战略武器技术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以仅占美国4%的试验次数（45:1030）和1:25的效费比，实现核装置设计水平与国际并跑。作为技术路线的总设计师，于敏主导建立的“理论先行—数值模拟—定向验证”研发体系，使我国避免了美苏曾经历的数千次试错性核爆，大大提高了数据获取率，尤其是在次级系统优化、材料方程修正等核心领域形成独特技术优势。这种集约化发展模式不仅夯实了国家安全基石，更开创了后发国家突破尖端国防技术的典范路径。于敏曾说：“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绝不能再受人欺负！”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辞世，以93岁高龄走完奋斗一生。工作人员在整理其书房时，发现23册跨越半个世纪的演算手稿，最新墨迹定格在生命烛火熄灭前72小时。从1961年埋名到生命终章，用58载春秋诠释了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人生价值。正如他诗中写的那样“身为一片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那些写满核物理方程的手稿，既是战略科学家的思维图谱，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于敏：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

□ 孙春胜

迭代运算，不仅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而且完整勾勒出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填补了中国氢弹理论研究的空白，为氢弹研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响起一声惊雷，万里碧空闪过炽烈耀眼的火光。这声惊雷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而令国际社会震惊的是其发展速度——从原子弹到氢弹试爆成功，中国仅用2年8个月的攻关周期，远超美苏等核大国耗时六七年的研发进程，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的奇迹。作为氢弹理论体系总设计师，于敏构建的“于敏构型”不仅奠定了氢弹构型设计的理论基础，更开创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技术路径，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尖端科技自主研发能力的跃升。

“身为一片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从1977年8月开始，于敏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开始了对中子弹的探索。次年秋，于敏在第一次中子弹技术讨论会上系统提出包含技术路径选择、关键瓶颈突破方案在内的研发框架，创造性制定“三阶段验证法”（即“三锤定音计划”）。在其战略部署下，科研团队历时十年攻克中子输运

方程求解、氦循环控制等核心技术，于1988年完成全球第四个中子弹实爆验证。这项突破不仅使我国战略核武器系统实现了跨越式升级，更标志着中国掌握从热核武器到特种核弹的系统研制能力，为构建现代化战略威慑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980年，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研发工程，带领团队研究并解决了从裂变材料压紧、中子注入及其增殖，到氦氖聚变燃烧过程的规律等问题，并且提出加大两个关键环节设计裕量的具体措施。这项开创性成果不仅直接构建起核武器升级迭代的关键技术范式，更是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核工程实现多维度技术跨越：初级小型化与中子弹原理验证取得突破性成果，武器化工程迈入实施阶段，次级小型化技术路线完成理论闭环。值此关键时刻，邓稼先、于敏洞见国际博弈态势，认为美国核武器设计逼近物理极限，或将通过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固化技术代差。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向中央递交了有关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这份凝聚深谋远虑的建

议书迅即获得中央批复，由此启动“863核试加速计划”，极大地保障了我国战略武器技术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以仅占美国4%的试验次数（45:1030）和1:25的效费比，实现核装置设计水平与国际并跑。作为技术路线的总设计师，于敏主导建立的“理论先行—数值模拟—定向验证”研发体系，使我国避免了美苏曾经历的数千次试错性核爆，大大提高了数据获取率，尤其是在次级系统优化、材料方程修正等核心领域形成独特技术优势。这种集约化发展模式不仅夯实了国家安全基石，更开创了后发国家突破尖端国防技术的典范路径。于敏曾说：“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绝不能再受人欺负！”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辞世，以93岁高龄走完奋斗一生。工作人员在整理其书房时，发现23册跨越半个世纪的演算手稿，最新墨迹定格在生命烛火熄灭前72小时。从1961年埋名到生命终章，用58载春秋诠释了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人生价值。正如他诗中写的那样“身为一片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那些写满核物理方程的手稿，既是战略科学家的思维图谱，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议书迅即获得中央批复，由此启动“863核试加速计划”，极大地保障了我国战略武器技术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以仅占美国4%的试验次数（45:1030）和1:25的效费比，实现核装置设计水平与国际并跑。作为技术路线的总设计师，于敏主导建立的“理论先行—数值模拟—定向验证”研发体系，使我国避免了美苏曾经历的数千次试错性核爆，大大提高了数据获取率，尤其是在次级系统优化、材料方程修正等核心领域形成独特技术优势。这种集约化发展模式不仅夯实了国家安全基石，更开创了后发国家突破尖端国防技术的典范路径。于敏曾说：“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绝不能再受人欺负！”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辞世，以93岁高龄走完奋斗一生。工作人员在整理其书房时，发现23册跨越半个世纪的演算手稿，最新墨迹定格在生命烛火熄灭前72小时。从1961年埋名到生命终章，用58载春秋诠释了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人生价值。正如他诗中写的那样“身为一片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那些写满核物理方程的手稿，既是战略科学家的思维图谱，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议书迅即获得中央批复，由此启动“863核试加速计划”，极大地保障了我国战略武器技术体系的完整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以仅占美国4%的试验次数（45:1030）和1:25的效费比，实现核装置设计水平与国际并跑。作为技术路线的总设计师，于敏主导建立的“理论先行—数值模拟—定向验证”研发体系，使我国避免了美苏曾经历的数千次试错性核爆，大大提高了数据获取率，尤其是在次级系统优化、材料方程修正等核心领域形成独特技术优势。这种集约化发展模式不仅夯实了国家安全基石，更开创了后发国家突破尖端国防技术的典范路径。于敏曾说：“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完全禁止。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核武器，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但也绝不能再受人欺负！”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辞世，以93岁高龄走完奋斗一生。工作人员在整理其书房时，发现23册跨越半个世纪的演算手稿，最新墨迹定格在生命烛火熄灭前72小时。从1961年埋名到生命终章，用58载春秋诠释了用生命铸成“国之重器”人生价值。正如他诗中写的那样“身为一片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那些写满核物理方程的手稿，既是战略科学家的思维图谱，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改革先锋